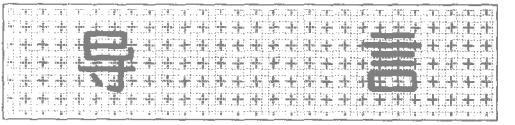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研究现状与主要问题

中美两国自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长达 20 余年的敌对,是战后世界史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它对于同时期全球和东亚区域的国际体系，对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甚至对于两国关系在对抗结束后的长期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探明这种敌对的由来，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中美敌对形成于 1949 年和 1950 年，并且迅速地激化为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大规模交战。这个历史过程，由于其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引起了美国学者经久的兴趣。1959 年，约翰·斯帕

尼尔发表了有关该领域的第一本比较著名的学术专著。[①]接着，艾伦·惠廷以中国加入朝鲜战争的决策动机和宏观决策过程为焦点，对当时美国和新中国的关系作了局部性的详细研究。[②] 1963年，美籍华人学者邹锐发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其中有两章论述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③]此书结构宏大，首尾一贯，论点鲜明，表现了深厚的当代史研究及理论思考功力。然而，50和60年代的这些著作表现了“冷战自由主义的支配性影响”。[④]它们强调美国政策的根本弊端和失败原因在于天真或迂腐，在于政策目标超出了可得到的政策手段，而且它们大都包含着对新中国的敌意。70年代起，由于越南战争造成的心理震荡和反省，加上有关档案陆续解密开放，美国学者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步。新一代论著基本上抛弃了美国政策过于“理想主义”的观点，对新中国的态度也比先前明显改善。1978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发起召开学术会议，探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在1947至1950年间未达成和解，反而开始了一种将持续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史性敌对”。会议论文集在国内外造成了重要影响，为不少年轻学者指示了探究方向。[⑤]以后，威廉·斯图克为了寻求中美在朝鲜冲突的根源，研究了美国对华和对朝政策。罗伯特·布鲁姆从美国东亚政策演变的角度，阐述了对华遏制的形成过程。南希·

①斯帕尼尔（John W. Spanier）：《杜鲁门——麦克阿瑟争执与朝鲜战争》，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9年版。

②惠廷（Allen S. Whiting）：《中国跨过鸭绿江》，斯坦福1960年版。

③邹锐（Tang Tsou）：《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1963年版。

④沙勒（Michael Shaller）：《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纽约1979年版，第xi—xii页。

⑤博格、海因里希（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合编：《未定之秋——1947至1950年的中美关系》，纽约1980年版。引文见该书第vii—viii页。

塔克着重考察美国承认新中国问题，由此分析美国对于中国革命的反应。① 其他有关论著不胜枚举。

美国学者对探明 1949 至 1950 年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方法上说，他们的长处首先在于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政府档案资料和私人文件。这使他们能够相当细致地再现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和决策者的某些深层动机。有些学者还仔细剖析了“公众舆论”的内在构成及其政治影响渠道，或把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其东亚政策乃至全球战略密切联系起来。② 重视研究决策者个人的作用也是他们的一个长处，这方面的一些专门著述丰富了本领域的成果。③从研究结果看，他们的最大贡献是大致园满地解答了一个同当时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密切相关的

① 斯图克（Willam W. Stueck）：《走向对抗之路》，北卡罗来纳州查帕尔希尔 1981 年版；布鲁姆（Robert M. Blum）：《划线——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起源》，纽约 1982 年版；塔克（Nancy Bernkopf Tucker）：《尘埃中的轮廓——中美关系和关于承认问题的争执（1949—1950）》，纽约 1983 年版。

②塔克把“公众舆论”分解为“院外援华集团”、传教团体、新闻界、学者、国会议员和一般“公众”，对它们的态度和影响渠道等一一予以论述。（见塔克：《尘埃中的轮廓》，第 5—10 章。）布鲁姆把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当作美国东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见布鲁姆：《划线》又见沙勒：《美国对日占领——亚洲冷战的起源》，牛津 1985 年版，第 10—11，14—15 章。）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根据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论述了对新中国的政策（见加迪斯：《遏制战略史》，纽约和牛津 1982 年版，第 1—4 章。）

③ 例如：海因里希（Waldo Heinrichs）：“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的眼界”；科恩（Warren I. Cohen）：“艾奇逊及其幕僚与中国”，俱载于博格、海因里希合编：《未定之秋》；史密斯（Gaddis Smith）：《艾奇逊》，纽约 1972 年版；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美国凯撒——麦克阿瑟》，纽约 1978 年版。

问题，即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和政策行为。[①] 在一些较为局部的问题上，若干美国学者也发表了精湛的见解，特别是提出（但未足够严密地阐明）1950年上半年美国的东亚战略出现了大变化趋势，从而为此后出兵朝鲜和武装干涉台湾准备了背景原因。这可称为近年来关于 40和 50 年代之交美国东亚政策最重要的研究动态之一。[②] 此外，斯图克强调对美国所作承诺的“可信性”的重视在决定美国东亚政策和对华政策上起了重大作用，詹姆斯·麦特雷和布鲁斯·卡明斯指出东亚遏制政策包含了“推回去”（或“解放”）的因素，这是杜鲁门政府试图用武力统一朝鲜，从而导致中国参战的一个重要原因，罗斯·凯恩等人揭露了“院外援华集团”的有关活动和影响。[③]

但是，美国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带有某些根本性的缺陷。他们普遍地美化了杜鲁门政府，把中美敌对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归咎于美国国会内外的亲蒋势力，或归咎于中美两国以外的因素，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在邹锐和惠廷看来，杜鲁门政府

①他们认为，行政当局在国民党政权面临覆灭的情况下试图逐渐摆脱其牵累，亦即甩包袱，但各种因素使美蒋关系得以延续下去。邹锐最初提出并系统地论证了这一点。以后的学者补充了许多史实和分析，但未超出邹锐的论断。

②参见：“讨论记要”，载于博格和海因里希合编：《未定之秋》，第 127—128 页；海因里希：“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和亚洲冷战的新看法”，同上，第 287页 斯图克：《走向对抗之路》，第 151 页；卡明斯（Bruce Cumings）编：《冲突之子——1943 至 1953 年的美韩关系》，西雅图 1983 年版，第 32—38 页。

③斯图克：《走向对抗之路》，第 6—8 页 麦特雷（James I. Matray）：“杜鲁门的取胜计划——民族自决和在朝鲜划三八线的决定”，载于《美国历史季刊》，第 66 卷第 2 期（1979 年 9 月），第 314—317 页；凯恩（Ross Y. Koen）：《美国政治中约院外援华集团》，纽约 1974 年版；基莱（Joseph C. Keeley）：《院外援华集团分子——科尔伯格其人》，纽约州新罗歇尔 1969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意欲同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但国会共和党人的阻挠和中国共产党“蓄意激怒西方国家”的政策使它无法这么做。① 70 年代以后的著作在这些方面与之大同小异。沃伦·科恩认为阻碍中美和解的因素有二，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反美态度（尽管中共“对于同美国和解并非无动于衷”），二是美国国内再三与行政当局为难的亲蒋势力。塔克则断定，美国主要决策者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样希望中美和解，他们期待国内亲蒋势力会由于台湾“失陷”而不攻自破，但朝鲜战争的爆发“突然取消了”关系正常化的可能。刘易斯·普里福伊甚至说，杜鲁门政府遏制新中国的真实用意无非是“遏制美国麦卡锡之流的狂怒”。②

在美国决策者中，国务卿艾奇逊得到了格外的谅解和赞扬。据称，艾奇逊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是为了准备同中国共产党和解。他努力为他的和解计划寻求国内舆论支持，“鼓励同共产党领导人接触”；“断言承认(中国新政府)不应被视为政治武器”；“焦急地等待”台湾易手为美国同新中国和解铺平道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对毛泽东政府的态度仍然是灵活的”，准备战争一结束就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干涉，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才放弃和

① 邹锐：《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 513，517，519，548 页；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江》，第 12 页。

② 科恩（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 2 版。纽约 1980 年，第 205 页 塔克：《尘埃中的轮廓》，第 181—183，194—195 页；普里福伊（Lewis McCarroll Purifoy）：《杜鲁门的对华政策 —— 麦卡锡主义和歇斯底里外交（1947—1951）》，纽约 1976 年版，第 xiv—xv 页。又见：菲斯（Herbert Feis）：《从信任到恐怖》，纽约 1970 年版，第 406 页 史密斯：《艾奇逊》，第 122 页 曼彻斯特：《美国凯撒》，第 649页 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第 199—202 页；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1949—1969)》，纽约 1972 年版，第 23，69 页。

解企图。[①] 总之，这位对华政策主要制订者被描绘成“渴望同毛泽东政权建立尽可能好的关系”，他“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缺乏主观努力”。[②]

溢美杜鲁门政府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美国学者们未准确地理解美国决策者（特别是艾奇逊）关于中苏矛盾的观念。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艾奇逊等人力图以对华和解努力促使中国共产党疏远苏联。离间中苏关系的考虑“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导致了争取摆脱国民党政权的企图和准备同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政策。[③] 其次，美国学者把试图逐步摆脱国民党政权和试图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等同起来，似乎既想弃蒋必不反共。他们甚至缺乏根据地断言，艾奇逊打算停止援蒋和默认台湾“陷落”的主要原因是要同新中国和解。[④] 纠正这两方面的错误，是有关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的先决条件。

美国学者们的研究还存在其他缺陷。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承认问题、台湾问题和朝鲜战争上，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特

①科恩：“艾奇逊及其幕僚与中国”，第 25，33 页；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 207，209 页；海因里希：“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和亚洲冷战的新看法”，第 287 页；塔克：《尘埃中的轮廓》，第 3，17，191 页；斯图克：“向鸭绿江挺进”，载于卡明斯编：《冲突之子》，第 235 页。

②科恩：“艾奇逊及其幕僚与中国”，第 25，32 页。科恩的观点得到 1947 至 1950 年中美关系讨论会的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见《未定之秋》，第 54 页。

③史密斯：《艾奇逊》，第 125，172 页；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 201 页；塔克：《尘埃中的轮廓》，第 27—32 页；加迪斯：《遏制战略史》第 63—103 页；杰维斯（Robert Jervis）：“朝鲜战争对冷战的影响”，载于《冲突解决季刊》，第 24 卷第 4 期（1980 年 12 月），第 515 页。

④科恩：“艾奇逊及其幕僚与中国”，第 23—24，32 页；塔克：《尘埃中的轮廓》，第 vii，79 页。

别是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问题和对华遏制问题。这种片面性是和自觉或不自觉地美化美国政策的倾向一致的。象本书将要说明的那样，美国国务院主要由于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国际联合阵线破裂，从承认问题“不是赢得共产党政权让步的主要手段”这一观点出发，曾短暂地和勉强地考虑承认新中国，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则是显著地表现了摆脱国民党政权的企图。因此，集中于承认问题和台湾问题，似乎比较有助于得出美国政府试图同新中国和解的结论。至于朝鲜战争，在有关对华政策的范围内，一些美国学者主要着眼于杜鲁门、艾奇逊同麦克阿瑟的分歧，着眼于中美之间据认为导致战争的误解，这些都有利于维持他们所描述的美国政策图景。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对美政策，美国学者的论著中也可见种种错误的认识。某些人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甚至把意识形态因素简单地局限于中苏之间的思想联系，认为中共对美国的态度完全取决于美国对苏联的态度，用苏美对立来解释中美对立。① 然而，自 70 年代初起更流行的观点是夸大中国共产党同美国和解的意图，夸大当时的中苏分歧，不适当地贬低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意义。一些学者认为中共渴望通过与美国改善关系来制约苏联和谋取经济援助，中美和解未能实现，从中国方面来说是因为党内“亲苏派”的阻力、基层党员的过激情绪以及苏联

① 惠廷：《中国跨过鸭绿江》，第 1—13 页；戈德斯坦：（Steven M. Goldstein）：“中共对美政策——机会和制约（1944—1950）”，载于博格、海因里希合编：《未定之秋》，第 235—278 页；莱文（Steven I. Levine）：“论苏联在华政策和中共的观念”，同上，第 293—303 页。

的压力所致。①这种观点可以说是美国谋求和解论的配对物，它导致了有关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丧失机会”之说。②

80 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学者发表了一批有关的论著，由此结束了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大致仅由美国学者阐释的局面。这些论著的基本观点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与美国学者中间最流行的判断大体相同，即把艾奇逊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当作现实主义的，其总方向是从中国内战脱身，同新中国建立非敌对关系；艾奇逊为建立这种关系作了很大努力，但终未贯彻到底，因为美国先前援蒋内战在中国造成了仇美情绪，国会内外的亲蒋势力也与他为难，加上他本人的反苏反共反革命观念限制了他的对华现实主义政策。③或许可以说，这种观点的基本思路，亦可见于沃伦·科恩和南希·塔克等美国研究者的著作中，那就是从杜鲁门政府争取摆脱国民党政权的尝试及其对中苏分裂怀抱的希望中，直接

① 韩德（Michael Hunt）：“毛泽东和对美和解问题（1948—1950）”，载于博格、海因里希合编：《未定之秋》，第 185—233 页 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 199—200 页；扎格里亚（Donald Zagoria）：“毛泽东在中苏冲突中的作用”，载于《太平洋季刊》，第 47 卷第 2 期（1974 年夏），第 140 页；布海特：《美苏在亚洲的关系（1941—1954）》，俄克拉何马州诺曼 1981 年版，第 82—86 页 斯图克：《走向对抗之路》，第 72 页。

②扎格里亚：“遏制与中国”，载于加蒂（Charles Gadi）编：《置熊于笼——遏制和冷战》，印第安纳波利斯 1974 年版，第 109—127 页；布海特：《美苏在亚洲的关系》，第 75—86 页；托平（Symore Topping）：《来往于两个中国之间》纽约 1972 年版，第 89—90 页。参见：莱文（Steven Levine）：“关于‘在中国丧失机会’的思考”，载于《当代中国》，第 1 卷第 3 期（1972 年 12 月），第 31—32 页；邵玉铭：“司徒雷登暨一九四九年美国与中共寻求和解秘辛——美国是否另一次‘在中国失掉机会，？”载于《传记文学》（台湾），第 24 卷第 6 期，第 10—19 页。

③高明振、林利民：“试评新中国成立前后艾奇逊的对华政策”，载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导出它企图同新中国和解的结论，然后用某些历史材料来证明这个结论，并用这个结论来解释美国对新中国的行为。

我国大陆学者中间的第二种观点，是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半里，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采取的政策既非争取和解，亦非敌对、遏制和孤立，而是“等待尘埃落定”。换言之，这段时期里美国决策者始终观望不决，举棋不定，未形成比较明确、比较连贯的基本行动方针。决定美国态度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对中苏关系的估计。1949 年上半年，美国政府主要从促进中苏矛盾的考虑出发，留有承认新中国的余地，制订了比较宽松的对华贸易政策文件；1949 年下半年，视中共恪守苏联路线的看法逐渐加强，但分化中苏关系的考虑仍使美国政府规避对新中国采取公开敌对态度，甚至 1950 年 2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华盛顿的主要决策者仍认为应当留有改善关系的余地；在这段时期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几乎始终包含着争取中共疏远苏联的动机，即使这越来越被当作一种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的长远希望。①

本书著者以及其他几位学者持有第三种观点。代表这种观点的一批论文强调杜鲁门政府摆脱国民党的尝试与其对新中国的态度之间并无因果联系，既注意它对中苏分裂所作的长远推测，更注重它对中苏关系实况、促进中苏矛盾的策略方式、用和解行动离间中苏关系的成效和利弊得失等问题的具体认识和设想，并且将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放在东亚遏制战略的框架内考察。这种观点认为：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里，对新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敌视政策，即排除对话，不予外交承认，组织孤立新中国的国际阵线，想方设法加剧新中国的经济困难，包括

①主要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第八、九章；袁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观”，载于袁明、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严厉限制对华贸易，力图尽可能阻止台湾和西藏的解放，制订和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并把这当作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的一大环节；这种政策的各具体方面，大多在 1949 年上半年即已存在，其余（除阻止西藏解放）形 成于是年夏秋之交；美国的上述行为既出于对多种利益的权衡，也出于意识形态和情绪的驱使，是中美对抗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反对、孤立和遏制新中国这一点上，艾奇逊及其幕僚同国会内外的亲蒋势力没有什么大区别，关于中苏最终可能分裂的推测也没有真正导致美国政策的温和化；对艾奇逊来说，争取摆脱国民党和反对新中国是东亚遏制战略的两个侧面，它们同加速复兴日本、着手支持法国的印度支那战争、确定西太平洋防御环带等重大举措一起，构成了美国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反应。①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依据广泛的历史资料，为这第三种观点提供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释。

从本质上说，中美敌对的由来表明了 20 世纪后半期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典型的历史过程：一个帝国敌视、压迫和威胁一个通过革命获得新生的民族，以致后者不得不奋起捍卫自身的安全和革命成果，迫使前者尊重其力量。历史的细节不会重演，但它的某些基本特征是长存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帮助人们认识这些特征，从而更准确地观察世界形势并且合理地决定自己的行动。

①王建伟：“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载于《世界历史》1986 年第 11 期 ;时殷弘“决定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政策的几个基本观念”，载于《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 ;时殷弘“论美国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0)”，载于《世界历史》1991 年第 1期；陶文钊：“1949—1950 年美国对华政策与承认问题”,载于《历史研究》1993年第 4 期；时殷弘：“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载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三辑；时殷弘：“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载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蒋耘、时殷弘：“建国前后美国对西藏的图谋”,载于《西藏研究》1987 年第 1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部分

历史和观念

第二章 敌对的历史渊源

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的政策是 40 年代中后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继续，而扶蒋反共政策来源于美国政府在中国革命和世界政治的发展中逐渐定形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萌发之际,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五四运动期间，美国国务院开始搜集有关资料，试图了解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到 1924 年，美国政府已经得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且把这一事态同中国的大革命浪潮联系起来。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舒尔曼向柯立芝总统报告说，中国的动乱可

能导致一个苏俄式的政府上台。[①] 北伐战争前夕，蒋介石制造反共的“中山舰事件”，这使美国驻华官员感到鼓舞，认为广州政府中的‘稳健派’可能压倒‘过激派’，采取较为保守的政策”。[②] 不过，在 1927 年春夏以前，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它注意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中的苏联顾问，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人。[③] 同时，它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趋势不甚明了，对国共两党基本上不加区别。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它才醒悟过来。[④] 但无论如何，象一些学者揭示的那样，北伐战争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明显的敌意。[⑤] 这种敌意主要来自反共反苏意识形态和对丧失美国在华特权的担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几乎完全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态，美国人只能从零星的间接报道和国民党的诬蔑性宣传中，得到若干非常片面和被严重歪曲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无知和偏见

① 科恩（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 2 版，纽约 1980 年，第 164—165 页。

②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6 年第 1 卷，华盛顿 1941 年版，第 701 页。

③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 164 页。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奇怪。甚至大革命后期同中共有直接接触的美国左翼人士安娜·路易·斯特朗和厄尔·白劳德等人，在这方面的认识也非常模糊。见舒梅克（Kenneth E. Shewmaker）：《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纽约州伊萨卡 1971 年版，第 13—19 页。

④《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27 年第 2 卷，华盛顿 1942 年版，第 205，210—211 页 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纽约 1972 年版，第 131—133 页 沈予：“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载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

⑤ 同上 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载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6—123 页。

加在一起，使得绝大多数同中国有关的美国报人和学者把中国共产党人想象为“土匪”。美国政府也大致如此。1930年秋，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告诉国务院：中国先前确有一个在莫斯科激励下的共产党，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在该国各个地区兴起的反对合法权力的无法无天分子”，他们自称共产党，只是为了“被人认为高出普通盗匪的范畴”。到1935年，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认为，与其把中国共产党人称作“真正的共产党”，不如称“共匪”或“所谓‘赤色分子’”。① 这种观念的根源，一是认定以农村为基地的、非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运动绝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将共产主义和中国国情对立起来，认为除非由苏联扶植，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能在中国成长。在美国政府中，只有两名低级外交官对中国共产党有比较准确的认识。驻汉口副领事爱德蒙·柯乐布于1932年4月撰写长篇备忘录，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武装斗争是一场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革命，它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两年后，驻汉口总领事沃尔特·亚当斯提出报告，认为中共不是土匪，也不是苏联的代理人，而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② 但是，这样的看法根本不能被美国国务院采纳。③

不管美国政府的认识多么背理，只要中国共产党被认为危及美国在华权益，就必然遭到它的敌视。这种敌视曾驱使在华美军攻击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7月底，红军占领长沙，美舰“帕洛

①舒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1—25页；科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67—169页。

②柯乐布（O. Edmund Clubb）：《中国共产主义——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纽约1968年版；沙勒（Michael Schaller）：《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纽约1979年版，第9页。

③《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9—10页柯乐布：《我与见证》纽约1974年版，第42—43页。

斯号”兵临城下，意欲保护美国在那里的势力，包括著名的文化据点雅礼学院。红军部队面临外国武装干涉威胁，举枪射击，“帕洛斯号”立即猛烈开火，并且同随之而来的其他外国兵舰和国民党炮艇一起组成“海军火力网”。“洛帕斯号”的行动受到了美国政府赞赏。长沙事件后不久，国务院经胡佛总统批准，把北伐战争期间确定的只保护在华美国人生命的政策，正式改变为既保护其生命也保护其财产，以便对付红军这一被称为“劫掠成性和不负责任的武装力量”。据此，美国兵舰准备攻击可能进攻武汉的红军部队，并且事实上多次在长江沿线同红军交火。①为了从根本上铲除中国共产党及其影响，驻华大使詹森规劝国民党政府搞所谓农村改良，还鼓励美国传教士在这方面进行努力。②红军被迫长征后，美国官员们以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消耗殆尽，才在一个时期内不再留心中共问题，或者说，中共问题对他们来说已不复存在。③

然而，长征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重新成为美国不能不注意的一个政治因素。1936年底，在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形势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且同国民党达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谅解。中国共

① 托莱(Kemp Tolley)：《长江巡航——美国海军在中国》，明尼苏达州安那波利斯 1971 年版，第 192—198 页；霍伊特（Frederick B. Hoyt)：“1930 年夏——美国政策和中国共产主义”，载于《太平洋历史评论》，第 46 卷（1977 年 5 月），第 239—245 页。

② 汤姆逊(James C. Thomson)：《中国面对西方之际——国民党中国的美国改良者》，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9 年版，第 31，193，207—208 页。

③ 博格 Dorothy Borg)：《美国与 1933 至 1938 年的远东危机》，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64 年版，第 206 页。

产党表现出来的政治影响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其抗日主张符合美国限制日本扩张的愿望，而其为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日所作的政策减轻了美国的敌意。另一方面，西安事变刚结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开始通过英美报刊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实况，一年后又发表了《西行漫记》一书，轰动文坛。斯诺的著作同当时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需要相结合，一举推翻了中国共产党是“土匪”的流行观念，向全世界展示了它的正义面貌和伟大潜力。① 罗斯福总统饶有兴致地阅读了斯诺的这本书，并且从先前的侍卫、被美国海军派往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考察抗日游击战的伊万斯·卡尔逊那里，了解到八路军和中共敌后根据地的许多情况。② 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政府眼里，逐渐从危害美国在华权益的“土匪”，变成了一股有助于美国对付日本威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感到高兴，以为一个真正团结抗日、甚至走向民主化的中国正在出现。③ 但是，蒋介石蓄意限共反共，于 1941 年 1 月制造了皖南事变。尽管詹森在国务卿赫尔同意下，坐视蒋介石对中共同室操戈而不予干预，但事变的严重后果使华盛顿方面担忧起来。④ 3 月，国务院鉴于蒋介石可能进一步进攻中共，联合英国外交部共同要求国民党政府不要同中共完全破裂。稍前，作为罗斯福个人代表访问重庆的白宫助

① 斯诺（Edgar Snow）：《走向开端》，纽约 1958 年版，第 191 页；斯诺：《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纽约 1938 年版；舒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 47—62，367—368 页。

② 同上，第 100—106 页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20—21 页；卡尔逊（Evans F. Carlson）：《中国双星》，纽约 1940 年版。

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7 年第 3 卷，华盛顿 1954 年版，第 87，122 页；博格：《美国和 1933 至 1938 年的远东危机》，第 530 页。

④ 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42—43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